

20 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

何志龙

内容提要 本文¹认为,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结成“外围联盟”,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伊朗伊斯兰教革命后,尽管霍梅尼从意识形态出发强烈反对以色列,但因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两伊战争期间伊以仍然保持着秘密武器交易。随着冷战后苏联的解体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削弱,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伊以争夺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伊朗以反对中东和平进程和支持阿拉伯激进组织来对付以色列;而以色列则竭力把伊朗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大力渲染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伊核计划对中东稳定及世界和平的威胁,以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关注、制裁,甚至军事打击,保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国地位。

关键词 伊朗 以色列 关系

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强国,伊以两国不论是合作还是对抗,对中东地区局势均产生着重要影响。伊以关系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 Middle East 国际关系之一。国外对 20 世纪伊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两伊战争时期因“伊朗门”事件而引发的对伊以秘密武器交易的原因与影响的分析,以及在美国与伊朗关系中涉及到的伊以关系问题。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迄今尚属空白。

一、巴列维时期伊以结为战略盟友

伊朗国王巴列维(1941——1979 年在位)基于宗教感情和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开始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 1947 年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伊朗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成员国,与印度和南斯拉夫共同提出了“少数派”方案,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包括一个阿拉伯实体和一个犹太实体的联邦国家,维护巴勒斯坦的统一。当该方案被否决,联大表决“多数派”的分治方案时,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一同投票反对,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当以色列宣布建国并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尽管以色列政府承诺给予伊朗最惠国贸易地位,甚至不惜对伊朗官员行贿,但巴列维王朝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④。但是,巴列维王朝的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

¹ 本论文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537780)。

^④ 马苏尔·法尔汗:《伊朗与以色列关系》(Mansour Farhang, “The Iran-Israel Connection”),《阿拉伯研究季刊》(Arab Studies Quarterly) 1989 年冬季号第 2 卷第 1 期,第 85—98 页。

伊朗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巴列维认为,伊朗国家安全的威胁首先来自北方近邻苏联,其次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伊朗既存在着领土和边界之争,又有教派和民族矛盾的伊拉克。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巴列维王朝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伊朗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一根重要支柱。

为了应对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伊朗利用同样受到苏联威胁又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以色列。在巴列维看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地图由内环和外围构成,内环就是阿拉伯国家,而外围则由包括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组成。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形成较大压力,巴列维希望通过构建“外围联盟”(peripheral pact)牵制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所以伊朗不仅为伊拉克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提供方便,而且于 1950 年 3 月 6 日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但由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国内媒体、议会及宗教势力的反对,伊朗政府并没有给予以色列外交上的正式承认)^①。1953 年美国帮助巴列维恢复权力后,伊以关系有所发展,特别是 50 年代后期,随着 1958 年伊拉克革命后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阿拉伯激进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加强,巴列维进一步加强了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关系。巴列维邀请以色列情报人员“摩萨德”帮助建立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和训练伊朗军队,同时巴列维更加重视以色列对伊朗安全的重要作用。巴列维曾对以色列驻德黑兰首席大使奥利·鲁波纳尼说,伊朗与以色列联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让犹太国成为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进攻伊朗的一个牵制因素^②。在外围联盟战略思想指导下,伊以在支持、武装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方面进行了密切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摩萨德”把武器装备通过“萨瓦克”转交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美国军事专家曾对伊拉克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的评估认为,“他们能够抵抗伊拉克军队的猛烈攻击”,其原因是伊以的军事支持和巴列维王朝允许他们把伊朗领土作为基地和庇护所^③。

以色列也同样重视伊朗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价值,把发展与伊朗的关系作为对中东国家外交的重点。一方面,以色列不断寻求伊朗对以色列给予承认,扩大以色列在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了使伊朗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并希望伊朗帮助伊拉克的犹太人通过伊朗移居以色列。以色列基本实现了这些目标^④。以色列的军政领导人几乎都访问过德黑兰,而且大多数与巴列维进行过私下会晤^⑤。与此同时,巴列维的外围联盟战略思想与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的国家安全战略不谋而合,本·古里安曾设想以色列与北部的伊朗、土耳其和南部的埃塞俄比亚构成三角外围联盟,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非阿拉伯属性、反苏及其对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担心^⑥。共同的安全利益促使伊以进行了全面的合作。

伊以政治军事合作也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色列向伊朗出口

^① 马苏尔·法尔汗:《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第 85—98 页。

^② 苏拉波·苏罕尼:《实用主义的联盟:以色列与伊朗关系,1948—1988》(Sohrab Sobhani, *The Pragmatic Entente: Israel-Iranian Relations, 1948—1988*),普拉格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5 页。

^③ 纳德尔·恩特萨尔:《以色列与伊朗的国家安全》(Nader Entessar, “Israel and Iran’s National Security”),《南亚中东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004 年夏季号第 4 期,第 1—19 页。

^④ 格乌达特·巴格特:《伊斯兰共和国与犹太国》(Gawdat Bahgat,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the Jewish State”),《以色列外交》(*Israel Affairs*) 2005 年第 11 卷第 3 期,第 517—534 页。

^⑤ 萨缪尔·塞格沃:《伊朗三角:伊朗门事件中的以色列揭秘》(Samuel Segev, *The Iranian Triangle: The Untold Story of Israel Role in the Iran Contra Affair*),自由出版社 1988 年版,前言第 2 页。

^⑥ 伊塔梅尔·拉宾诺维奇、杰胡达·罗汉兹主编:《中东的以色列》(Itamar Rabinovich and Jehuda Reinharz(eds.), *Israel in the Middle East*),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4—171 页。

达 7000 万美元,而伊朗则是以色列石油需求的主要供给者。早在 1953 年,伊朗就与以色列签订了石油供给协议。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从伊朗进口的石油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出口西欧^①。随着 70 年代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和伊朗石油收入猛增,伊朗大量从以色列购置武器,每年进口达 5 亿美元之多^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与埃及在西奈半岛达成脱离接触协议,除了美国的积极斡旋外,巴列维也起了重要作用。巴列维向以色列承诺,一旦以色列交还埃及西奈油田后,伊朗将采取适当措施满足以色列的石油需求^③。也就是说,在力争缓和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同时,巴列维王朝虽然没有从外交上正式公开承认以色列,而且要求以色列撤回到 1967 年战争前的实际控制线,但它视以色列为战略盟友和制衡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有效工具,并希望通过伊以友好关系来促进美国的犹太院外游说集团促进伊美关系的巩固和发展^④。

二、霍梅尼时期伊以公开指责与秘密武器交易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霍梅尼开始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斗争。由于巴列维王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美国在阿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霍梅尼把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总是与反美反以交织在一起,把美、以、巴列维称之为三个“大撒旦”。霍梅尼指责巴列维在伊朗的专制统治是“为了犹太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⑤,把巴列维推行的“白色革命”,特别是其中涉及到宗教寺院土地的土地改革和世俗化改革,视之为反对伊斯兰。而与此同时,霍梅尼又把巴列维反对伊斯兰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联系到一起,认为巴列维王朝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而以色列则是巴列维及其反动专制王朝的帮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一样犯下了极大罪行^⑥。长期以来,霍梅尼视以色列如同一个“肿瘤”,如果不从该地区铲除,它将摧毁伊斯兰和穆斯林^⑦。70 年代,霍梅尼在标志其伊斯兰革命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伊斯兰政府》一书中,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其理论核心之一,并在后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环境有所恶化,伊以不仅仍然共同面临着苏联的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而且阿拉伯国家对伊朗保持高度警惕,伊朗对以色列也构成压力。以色列决策者对伊朗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影响的评估认为,以色列不能失去伊朗这个战略伙伴,伊朗起着对阿拉伯人的制衡作用^⑧。而且认为强烈反以的八旬老翁霍梅尼只是伊朗政坛上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① 马克·泰斯莱尔:《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与伊朗:以色列战略思考的几个因素》(Mark Tessler, “Israel, Arms Exports, and Iran: Some Aspects of Israeli Strategic Thinking”),《阿拉伯研究季刊》(*Arab Studies Quarterly*) 1989 年冬季号第 11 卷第 1 期,第 99—126 页。

^② 比萨拉·A·巴波:《以色列的地下武器网络》(Bishara A. Bahbah, “Israel’s Private Arms Network”),《中东报告》(*MERIP Middle East Report*) 1987 年 1—2 月份,第 11 页。

^③ 吉米·卡特:《保持信心——吉米·卡特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06 页。

^④ 格乌达特·巴格特:《伊斯兰共和国与犹太国》,第 517—534 页。

^⑤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337 页。

^⑥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第 341 页。

^⑦ 纳德尔·恩特萨尔:《以色列与伊朗的国家安全》,第 1—19 页。

^⑧ 加利·西科:《十月惊雷:伊朗的美国人质与罗纳德·里根的总统竞选》(Gary Sick, *October Surprise: America’s hostages in Iran and the election of Ronald Reagan*),时代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3 页。

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后霍梅尼时代的政治人物身上¹。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与伊领导层中的温和派秘密接触。

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是正确的,两伊战争把阿拉伯国家的注意力从阿以问题引向了两伊,大大减轻了以色列的压力。但让以色列担心的是,如果两伊战争伊拉克取胜,将极大地鼓舞阿拉伯民族主义,将对以色列构成更大压力。正如以色列的伊朗问题专家蒙纳什·阿米尔所指出的:“伊拉克的胜利将萨达姆·侯赛因推上扩张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领袖的宝座,必将对以色列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④因此以色列想方设法帮助伊朗加强国防。在美国人质危机中,以色列外长甚至建议美国向伊朗提供武器以解决人质问题。因为在战争初期,伊拉克攻势凌厉,伊朗失去大片领土,越发使以色列担忧。1980年9月28日,即两伊战争爆发后的第9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公开宣称,以色列愿意向伊朗提供援助以换取伊朗改变对以立场^⑤。以外长达扬也力促美国摒弃前嫌,帮助伊朗加强防御^⑥。1980年10月,达扬进一步强调,如果不及时向伊朗提供武器援助,伊拉克就有可能实现摧毁伊朗大部分军事力量的目标。在以色列的积极努力下,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向伊朗提供美制武器及部件开绿灯^⑦,甚至直接向伊朗提供武器,导致“伊朗门”事件的发生。以色列希望通过援助伊朗,使伊拉克军队陷入与伊朗的长期战争之中,转移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视,同时从经济上削弱伊拉克^⑧。据伊朗一位前官员称,在以色列情报人员的帮助和支持下,伊朗曾试图轰炸伊拉克的核设施,但未能如愿^⑨。1981年6月7日,以色列亲自出动战机炸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尽管以色列此举是基于自身未来安全考虑,但客观上对处于两伊战争中的伊朗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直接军事支持。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奉行“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对外政策,视美国为“大撒旦”,而苏联是“另外一个撒旦”,甚至苏联的威胁比美国更大,是伊朗的主要敌人;而且伊朗与西欧的关系也十分紧张;此外,霍梅尼主张输出伊斯兰革命导致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龃龉增加,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普遍采取防范甚至敌视立场。伊朗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再度重视以色列。两伊战争的爆发和伊朗在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进一步加强了伊朗温和派所坚持的发展与以色列“外围联盟”战略的决心。因为伊朗军队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巴列维时期由美国提供的美式装备,革命后与美国交恶,无法从美国得到武器及其部件。迫于无奈,伊朗曾在欧洲黑市上购买价高质劣的武器,而在此时,以色列愿向伊朗提供武器,霍梅尼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国家的存亡压倒一切。霍梅尼认为,伊朗与穆斯林的敌人打交道是为了伊斯兰事业的长远利益,并声称为了维护和扩大伊斯兰世界,可以不择手段^⑩。1981年初,霍梅尼对此事做出裁决,宣布伊斯兰共和国购买以色列制造的武器合法,只要没有与以色列人直接进行交易。同时霍梅尼称,那种流传的关于伊以武器交易的说法完全是“犹太复国主

¹ 特里塔·帕尔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估:从力量循环看其战略竞争》(Trita Parsi, "Israel-Iranian Relations Assess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Power Cycle Perspective"),《伊朗研究》(*Iran Studies*)2005年第38卷第2期,第255页。

^④ 丹尼尔·格夫罗:《一场结束不了的战争?》(Daniel Gavron, "An Unending War?"),《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1987年4月17日。

^⑤ 特里塔·帕尔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估:从力量循环看其战略竞争》,第255页。

^⑥ 特里塔·帕尔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估:从力量循环看其战略竞争》,第255页。

^⑦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86年11月29日。

^⑧ 约翰·P. 米格利塔:《美国与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联盟政策:1945—1992》(John P. Migletta, *America Alliance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92: Iran, Israel, and Saudi Arabia*),莱克森顿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158—159页。

^⑨ 加利·西科:《十月惊雷:伊朗的美国人质与罗纳德·里根的总统竞选》,第114页。

^⑩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第387页。

义的谎言”¹。这是两伊战争迫使伊朗不得不做出的一个外交妥协。但注重意识形态宣传的霍梅尼仍然强调反以色列的意识形态,以此保持国内民众的支持,并尽可能争取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同情和支持,至少不要形成以伊拉克为核心、公开反对伊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朗领导层的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了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对以色列政策的两面性,即公开言论指责,秘密武器交易。

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媒体关于伊朗与以色列秘密武器交易的报道很多。法国《世界报》称,在两伊战争初期,伊朗进口武器的80%来自以色列。伊以武器交易频繁,以色列军事技术人员帮助培训伊朗同行,以便把转送到伊朗的美制武器改装成“以色列制造”。以色列军事顾问还经常去伊朗,甚至前往两伊战争前线获取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做出评估,以便向伊朗提供所需武器^④。伊以首次秘密武器交易是战争爆发后不久,以色列向伊朗提供的“数千万美元的伊朗F-4战机使用的轮胎”^⑤。1981年7月,伊以达成一笔价值1.35亿美元的武器交易^{1/4}。以色列还通过荷兰和阿根廷向伊朗提供了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1/2}。在其后的5年多时间里,伊以又达成2.5亿美元的武器交易^{3/4}。

两伊战争结束后至海湾战争之前,以色列仍然坚持“外围联盟”战略。1987年,以色列总理拉宾提出必须保持与伊朗的地缘政治联盟。佩雷斯也坚持与伊朗建立“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督促里根政府寻求与伊朗对话,改善美伊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以关系。虽然巴列维王朝没有正式公开承认以色列,但视以色列为伊朗国家安全的战略盟友,双方进行了实质性的合作。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尽管与以色列存在秘密武器交易,这只是为了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反对以色列不仅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有具体行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500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进入黎巴嫩同以色列作战,并大力武装、培训和资助黎巴嫩真主党打击以色列。黎内战结束后,真主党继续与以色列扶植的“南黎巴嫩军”作战,有时直接进攻以色列国防军^⑧,其目标就是“在黎巴嫩消灭殖民主义,赶走以色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⑨。实际上,以色列对伊朗的言行心知肚明,也担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以伊武器交易也绝非以色列的战略选择,只是为了持续两伊战争、消耗两伊实力的一种策略。同时,以色列在以伊武器交易中的经济利益也十分可观。据认为,以色列提供给伊朗武器的价格是正常价格的数倍以上,大发两伊战争之财,并用此资金加速以色列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提高以色列的军事现代化水平^⑩。

三、冷战后伊以公开对抗及其原因

冷战后世界格局和中东局势以及伊朗和以色列国内政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伊以从秘密合

¹ 马苏尔·法尔汗:《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第85—98页。

^④ 皮埃尔·皮恩:《威胁》(Pierre Pean, *La Menace*),巴黎1987年版,第22—27页。

^⑤ 约翰·P. 米格利塔:《美国与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联盟政策:1945—1992》,第158页。

^{1/4} 《观察》(*The Observer*)1986年11月30日。

^{1/2} 《伊朗与以色列》(“Iran and Israel”),《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1982年10月29日。

^{3/4} 杰克·安德森:《再次给伊朗提供武器》(Jack Anderson, “Supply Weapons To Iran Again”),《华盛顿邮报》1986年4月30日。

^⑧ 彭树智主编,王新刚著:《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90、365页。

^⑨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第380页。

^⑩ 马克·泰斯莱尔:《以色列的武器出口与伊朗:以色列战略思考的几个因素》,第99—126页。

作走向公开对抗。首先,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对伊以国家安全的威胁消失;对以色列来说,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受苏联支持的叙利亚等国的威胁。其次,海湾战争及其后对伊拉克的长期制裁,极大地削弱了伊拉克,从而使伊拉克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也逐渐消失。最后,伊拉克入侵并吞并阿拉伯兄弟邻国科威特所导致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标志着对伊以安全构成重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衰退甚至终结,伊以面对的将是每一个有着不同国家利益的阿拉伯国家,而非与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阿拉伯民族或整个阿拉伯世界。共同敌人的消失和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伊以彼此成为中东地缘战略的竞争者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伊朗方面看,首先,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对武器的需求相对减小,因而也就不再需要通过以色列秘密购买美制武器,以色列的可利用价值减小。其次,两伊战争后,伊朗百废待兴,需要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关系。1989年6月3日霍梅尼病逝,伊国内政治发生了变化,温和派和改革派力量有所上升,也为改善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创造了条件。再次,伊拉克被削弱,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相对上升,增强了伊朗谋求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信心。从以色列方面看,首先,海湾战争虽然极大地削弱了伊拉克,大大减小了伊拉克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但海湾危机期间和战争之后,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有较大改善,相对降低了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威胁到以色列所长期坚持的与某一世界大国结成战略同盟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同时美国为巩固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力压以色列在领土方面做出让步,以色列担心自己可能成为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甚至与伊朗改善和加强关系的牺牲品。其次,冷战后,中东和平已成大势所趋,随着埃以和平、伊拉克的削弱和约(旦)以和平的实现,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采用军事手段消灭以色列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以色列开始构建在保持对阿拉伯国家军事优势的前提下,与阿拉伯国家和解,建立以色列主导的中东政治经济新秩序,即以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构想的“新中东”。最后,随着伊朗在中东地区地位的上升,由原来的对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制衡器变成了以色列在中东地区谋求霸权的挑战者,对以色列的“新中东”战略构成了威胁。

由于在上述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在新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伊以展开了激烈竞争甚至对抗。正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叶海亚·拉基姆·萨法维在伊朗某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伊以正处于一场全面的“非军事”战争之中¹。伊朗在海湾战争中给予美国一定支持,也得到了老布什政府的积极评价,国务卿贝克暗示伊朗“作为海湾地区的一个主要力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④。在中东和平问题上伊朗立场积极,表示只要伊朗不被排除在外,愿保持中立。伊朗希望在战后的中东地区安全安排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无论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还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总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即根据伊朗的面积、人口、教育水平和自然资源,伊朗注定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应该在该地区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然而,海湾战争后美国宣布保留萨达姆继续掌权以保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伊朗认为美国旨在让萨达姆政权制衡伊朗。特别是美国主导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将伊朗排除在外,更让伊朗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有意要遏制和孤立伊朗。因此在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之际,伊朗发起召集阿拉伯激进组织聚会德黑兰,加大反以宣传,反对美国倡导的中东和平进程。1993年9月

¹ 纳德尔·恩特萨尔:《以色列与伊朗的国家安全》,第1—19页。

^④ 肯尼斯·M. 博兰克:《波斯湾之迷:伊朗与美国的冲突》(Kenneth M. Pollack, *The Persian Puzzle: 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兰德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14日,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指责巴解组织“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卖国罪”,签署该协议是“卖国的第一步……它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拉夫桑贾尼还指责约旦和巴解组织领导人同意“与以色列领导人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呼吁“吉哈德”对以色列发动圣战¹。

伊朗反对阿以和谈的目的有三:一是对美以将伊朗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的报复,以此迫使美国承认伊朗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和作用。二是高举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大旗,树立伊朗的伊斯兰利益的真正维护者的形象。1998年5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亚辛时表示,伊朗将继续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的斗争,称以色列是“殖民势力在中东地区留下的恶性肿瘤”。1999年4月,伊朗以“为以色列和美国充当间谍”为由逮捕了13名伊朗犹太人,其中10人被判处徒刑^④,以此显示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三是虽然海湾战争和冷战的结束,伊拉克和苏联对伊朗的威胁消失,但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对伊朗构成了较大威胁,为了迫使美国从海湾撤军,伊朗尽力制造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阿以冲突的扩大会使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转向长期偏袒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最终将迫使美国从海湾撤军。四是谨防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全面和解,形成阿以联合孤立伊朗的局面,这是伊朗最不愿看到的中东格局。伊朗反对阿以和谈就是要激起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对抗,在以色列的强大压力下,迫使阿拉伯国家积极主动地改善和发展与伊朗的关系,使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结成战略联盟,反对美国,孤立以色列,从而实现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

面对伊朗的反以宣传和对反以激进组织的大力支持,以色列一改过去为了维护与伊朗的秘密合作而对伊朗反以言论保持沉默的立场,针锋相对,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举措。首先,与美国合作将伊朗排除在中东和平进程之外,迫使伊朗就范。“伊朗尽其所能地破坏谈判”^(四),显然与世界局势的缓和及中东地区民众普遍期待和平的愿望背道而驰,不仅使美国对伊朗的目的深表怀疑,而且也造成了伊朗与欧盟国家关系紧张,同时伊朗的立场也没有赢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甚至连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当事国——巴勒斯坦的惟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也对伊朗的立场不予支持,伊朗在中东地区更加孤立。正如克林顿政府的一位官员所言:“伊朗弄巧成拙。伊朗越是尽其所能地反对(和平进程),我们的和平努力就越能取得成功,伊朗就越孤立,我们就越能成功的包围伊朗,和平进程就越可能取得成功。因此,他们为了打破‘双重遏制’政策,就尽一切努力破坏和平进程。”^{1/4}显而易见,伊朗陷入了以色列设计的战略沼泽之中,越是挣扎陷的越深。2001年1月3日,以色列军队在公海上拦截了一艘伊朗货轮,据以色列称,该货轮向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秘密运送武器。虽然该事件尚存在诸多疑问,但以色列以此确认伊朗是“和平进程的主要威胁”,是“以色列真正的敌人”^{1/2}。

其次,以色列认为伊朗当局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遂加大了对这个政权对中东乃至世界威胁的宣传力度,使美国确信伊朗是中东地区不稳定的策源地,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一位资深中东专家的说法,把伊朗视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恐怖主义国家是以色列政治言论不可分割的

¹ 克拉克·斯戴滕:《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的和平协定:恐怖主义升级的原因?》(Clark Staten, “Israeli-PLO Peace Agreement: Cause of Further Terrorism?”),《紧急情况的网络新闻服务》(Emergency Net News Service)1993年9月11日。

^④ 刘仲华、王超编:《一九九九年西亚非洲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2000年版,第20页。

^(四) 西蒙·佩雷斯:《新中东》,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1/4} 特里塔·帕尔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估:从力量循环看其战略竞争》,第265页。

^{1/2} 杰西·奥尔默特:《真正的敌人是伊朗》(Yossi Olmert, “The Real Enemy Is Iran”),《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2002年1月10日。

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不论世界上哪个地方发生了恐怖事件,以色列都自然而然地指责伊朗。1987 年,拉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伊朗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我们不打算改变我们对德黑兰的政策”¹,而当时正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高潮时期。5 年后的 1992 年,尽管随着霍梅尼逝世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情绪大大消退,而总理拉宾却大加宣扬“伊朗的威胁”,伊朗是“黑色谋杀政权”,它制造了“浓烈的伊斯兰冲击波”。佩雷斯甚至声称:“伊斯兰共和国比希特勒更危险”,“伊朗是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颠覆主义的中心。”^④以色列“妖魔”化伊朗的目的有三:一是防止美国与伊朗改善关系,担心美伊接近可能削弱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影响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正如以色列的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伊法拉姆·伊巴所言:“在以色列充满着这样一种情绪,因为冷战的结束,美以关系趋于冷淡,我们需要某种促进美以联盟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就是激进的伊斯兰。而伊朗正是这种激进的伊斯兰。”^⑤因此以色列想方设法“使伊朗被西方国家所遗弃,特别是被美国所遗弃”^{1/4};二是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威胁比阿以问题更为严重,防止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改善关系,促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1/2},为建立以色列主导的“新中东”创造条件;三是促使美国确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威胁到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对其进行遏制,同时促使美国加大对以色列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伊朗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是平衡海湾战争后美国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所造成的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相对有所降低的影响。在以色列的大力宣传和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的积极努力下,尤其是以色列搭上了“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车,美国政府最终把伊朗确定为“邪恶轴心”、“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成为美国反恐的主要对象。

最后,大力宣传伊朗的核威胁。尽管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保持核模糊政策,但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色列为了保证国家的绝对安全,坚决防止中东地区任何敌视以色列的国家发展和拥有核能力^{1/4}。早在海湾战争后不久,以色列的几位颇具影响的战略家就提出了对付伊朗的新战略,要求政府尽一切努力劝导西方国家在伊朗发展拥有核能力之前“打败”伊朗,并为此设想创造一个如何“打败”伊朗的环境,类似于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的情况,要求宣传战、心理战和军事压力有效结合。以色列总理沙龙更是直言不讳:“以色列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⑧尽管伊朗政府一贯声称其核开发将用于和平目的,而且伊朗最高法院颁布法令,禁止伊朗使用核武器^⑨。但以色列对伊朗的目的颇为怀疑,认为伊朗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无需核能,核开发的目的旨在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某些领导人为了应对以色列的挑战和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时发表发展核武器的言词。如伊朗伊

¹ 特里塔·帕尔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估:从力量循环看其战略竞争》,第 263 页。

^④ 特里塔·帕尔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估:从力量循环看其战略竞争》,第 263 页。

^⑤ 特里塔·帕尔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评估:从力量循环看其战略竞争》,第 260 页。

^{1/4} 玛吉里·米勒:《以色列寻求孤立伊朗》(Marjori Miller, “Israel Seeks to Turn Iran Outcas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2002 年 2 月 6 日。

^{1/2} 伊利可·胡戈路德:《伊朗人看待阿以冲突》(Eric Hooglund, “Iranian Views of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95 年秋季号第 1 期,第 86—95 页。

^{1/4} 伊德·伯兰奇:《伊朗的科技进步给特拉维夫敲响了警钟》(Ed Blanch, “Iran’s Technology Advances Strike a Chord in Tel Aviv”),《中东》(The Middle East) 2004 年 12 月第 351 期,第 24 页。

^⑧ 尤兹·玛迈米、彼得·考纳迪:《以色列瞄准了伊朗的核设施》(Uzi Mahnaimi and Peter Conradi, “Israel Targets Iran Nuclear Plant”),《伦敦星期日时报》(London Sunday Times) 2004 年 7 月 18 日。

^⑨ 伊萨尼·I. 萨德尔:《伊朗的核计划对以色列的影响》(Ehsaneh I. Sadr, “The Impact of Iran’s Nuclearization on Israel”),《中东政策》(Middle East Policy) 2005 年夏季号第 2 期,第 58—72 页。

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将军积极主张伊朗发展核武器,他质疑:“我们用缓和政策能够抵挡美国的威胁和霸道行径吗?……我们签署禁止化学和核武器扩散条约能够保护伊斯兰共和国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吗?”萨法维甚至公开号召建立一支“1亿人的穆斯林游击队”与以色列战斗¹。类似好战言论的确让以色列感到担心,同时也使以色列有“证据”表明伊朗努力发展核武器并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以色列对伊朗核威胁的宣传基本达到了目的,即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注,保持美国 and 西方国家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并导致对伊朗的制裁,孤立和削弱伊朗,以便保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强国地位。

综上所述,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完全基于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地缘政治战略利益。虽然随着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伊以从盟友走向对抗,但仍然没有超越这两种利益范畴。如果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别是霍梅尼时期强调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对以色列意识形态,以及冷战后以色列大力渲染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也基于这两种利益。

[本文作者何志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西安 710062]

(责任编辑:马新民)

¹ 《伊朗时报》(*Iran Times*)2002年10月18日。